

# 文化的转轨

『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81）

程光炜 著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

程光炜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文化的转轨

『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81）

程光炜 著

程光炜 主编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81/程光炜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1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6401-0

I. ①文… II. ①程… III. ①文学家—文学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4483 号

- |       |                                                                 |
|-------|-----------------------------------------------------------------|
| 书 名   | 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1949—1981）                                    |
| 著作责任者 | 程光炜 著                                                           |
| 责任编辑  | 张雅秋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6401-0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pup.cn">http://www.pup.cn</a>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a href="mailto:pkuwsz@126.com">pkuwsz@126.com</a>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7065                          |
| 印刷者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21.5 印张 300 千字                           |
|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52.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从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算起,中国当代文学的建史和研究,已经足足60年。在中国历史上,这60年是社会最为动荡又充满历史机遇的一个年代。但放在一百七十多年来的视野里,人们并不会为它离奇剧烈丰富的故事而惊诧。“当代文学”就发生在我们共同记忆的这一历史时段中。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我们无法无视历史的存在,将文学看做一个“纯文学”的现象,也无法摆脱文学与历史的无数纠缠,将作为研究者的自己置身事外。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懂得中国当代文学学科为何迄今为止都没有像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那样建立学术的自足性、规范性,反而屡屡被人误解和贬低。更容易看清楚的是,如果当代史观到今天还没有在幅员辽阔的大地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那它势必会不断动摇与该史观息息相关的当代文学史的思想基础和学科基础。

当代文学史学科自律性一直缺乏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下限始终无法确定。2000年后至今,当代作家的大量新作有如每年夏季长江的洪峰一样奔腾不息,即使声名显赫的老作家也未曾歇笔,对自己的思想头绪稍作整理,并对历史作更深远的瞭望。对新作的关注,仍然是最热门的事业。这就使当代文学很多从业者不得不放弃寂寞的研究,转入更为丰富多彩的当代文学批评之中。当代文学批评在慷慨地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鲜视角和信息的同时,也在那里蹂躏涂抹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的界限。著名作家的新作,还会冲刷、改写和颠覆当代文学以往历史的文学价值,“超越”依然是当代文学批评最动人的词汇,正是它造成了当代文学观念的不断的撕裂。这种情况下,当代文学的标准和研究规范经常被挪动,也就不难理解。

本丛书提倡从切实材料出发,以具体问题为对象,对当代文学史的

“史观”展开讨论,据此观察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展开,影响文学思潮、流派、文学批评和作家创作的历史因素究竟是什么。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我们就能逐渐知道,它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环境中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本丛书主张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认为先划出一定历史研究范围,如“十七年文学”“80年代文学”等等也许是有必要的,它会有利于研究问题的分层、凝聚和逐步的展开。对具体历史的研究,可能比宏篇大论更有益于问题的细致洞察,强化研究者对自身问题的反省,所谓的历史化也只能这样进行。

本丛书以文学史研究为特色。丛书作者以国内一线学者为主,但不排斥年轻新秀优秀著作的加入,更欢迎海外学者的加盟。既为文学史研究丛书,自然希望研究者以经过沉淀的、深思熟虑的文学现象为对象,不做简单和草率的判断;它强调充分尊重已有的成果,希望丛书的风格具有包容性,也主张收入本丛书的著作对不同于自己观点的研究拥有包容性。

本丛书是对60年来当代文学史研究多次努力的又一次开始,这是一项长期和耐心的工作。它并不奢望自己的出版能改变什么,但也相信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前途并不糟糕。

丛书主编 程光炜

# 目 录

|                     |       |
|---------------------|-------|
|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 | 程光炜/1 |
|---------------------|-------|

|                       |     |
|-----------------------|-----|
| 第一章 找一个根据 .....       | 1   |
| 一 1938 年的武汉 .....     | 5   |
| 二 毛泽东的评论 .....        | 10  |
| 三 周扬的出场 .....         | 16  |
| 四 学者王瑶 .....          | 24  |
| 五 现代文学研究各家 .....      | 34  |
| 六 文学史方案 .....         | 43  |
| 第二章 怎么办 .....         | 52  |
| 一 表态 .....            | 53  |
| 二 展望 .....            | 59  |
| 三 在苍茫大海间 .....        | 69  |
| 四 重编和排序 .....         | 76  |
| 第三章 鲁迅的塑造 .....       | 85  |
| 一 文化转向 .....          | 88  |
| 二 “毛选”与《鲁迅全集》 .....   | 95  |
| 三 “故居”“纪念馆”中的鲁迅 ..... | 101 |
| 四 “鲁学” .....          | 109 |
| 五 许广平、周作人 .....       | 116 |
| 六 鲁迅与当代 .....         | 128 |
| 第四章 郭沫若之路 .....       | 134 |
| 一 处境和心态 .....         | 135 |
| 二 文化观和历史观 .....       | 144 |

|                               |            |
|-------------------------------|------------|
| 三 《蔡文姬》的创作和演出 .....           | 153        |
| 四 政治抒情诗、纪游诗及其他 .....          | 162        |
| 五 “中国歌德”现象之追究 .....           | 173        |
| 六 郭氏思想述略 .....                | 184        |
| <b>第五章 茅盾、老舍的问题 .....</b>     | <b>192</b> |
| 一 茅盾的“矛盾” .....               | 194        |
| 二 老舍与北京 .....                 | 201        |
| 三 茅盾的文艺观 .....                | 213        |
| 四 《茶馆》 .....                  | 223        |
| 五 茅盾的批评和批注 .....              | 230        |
| 六 茅盾、老舍之异同 .....              | 237        |
| <b>第六章 巴金和曹禺的激情 .....</b>     | <b>246</b> |
| 一 “我是来学习的” .....              | 246        |
| 二 巴金水平的滑坡 .....               | 255        |
| 三 “人艺”的舞台 .....               | 262        |
| 四 小说《团圆》叙事的艰难 .....           | 269        |
| 五 《雷雨》的修改 .....               | 274        |
| 六 文学内外的现实 .....               | 282        |
| <b>第七章 “文革”与晚年的双重变奏 .....</b> | <b>288</b> |
| 一 边缘与闲居 .....                 | 290        |
| 二 “大字报”与“牛棚” .....            | 298        |
| 三 投湖与苟活 .....                 | 304        |
| 四 “复出”之后又怎样? .....            | 311        |
| 五 迟到的《随想录》 .....              | 315        |
| 六 对辞世仪式的解读 .....              | 321        |
| <b>参考文献 .....</b>             | <b>328</b> |
| <b>后 记 .....</b>              | <b>334</b> |

## 第一章 找一个根据

将“鲁郭茅巴老曹”树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心作家的做法,最早可能出自1951年9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但直到1979年唐弢、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学者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辛苦布局才被落实并传布开去。按照一般常识,作家之正宗地位总是说明他与一定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也许还是多方面因素合作促成的结果。处在20世纪中国文学政治化的大过程中,其中的头绪就显得驳乱复杂。不过,“鲁迅之死”应是诸多线索中的一个值得梳理的起点,是我们讨论问题的第一个落脚处。

1936年10月19日,曾以小说参加五四文学革命,后经厦门和广州逃亡到上海并在该城寓居十年的作家鲁迅病逝。他与苏联作家高尔基和老师章太炎死在同一年。躲在家中不敢出门的左翼作家冯雪峰打电话向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求助,宋委托沈钧儒律师事务所在虹桥公墓买了一块墓地。鲁的遗体当日下午3时移至万国殡仪馆,21日下午入殓。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本是极普通的事,鲁迅生前也从未视自己为伟大。这些表面虽似末端细节的人生故事,不想却被不少人的想象力放大,在以后半个多世纪里经常与一些大事勾织连结。其因果关系,直至许多年后才渐看明白。

这些类似古代悼文的文字,略带夸张地记录下了作家们眼中的鲁迅之死:“像散沙一般,正要团结起来;像瘫病一般,将要恢复过来;全民族被外力压迫得刚想振作,而我们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奋进的大将忽然撒手去了。”<sup>①</sup>“这消息像闷雷似的,当头打了下来,呆坐在那

---

① 孙伏园:《哭鲁迅》,《潇湘涟漪》(长沙)第2卷第8期,1936年11月。



里不言不动。”<sup>①</sup>“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sup>②</sup>“旁边花圈上一条白绸带写着‘先生精神不死。’然而我心上的缺口却是永不能够被填补的了。”<sup>③</sup>

报人曹聚仁的回忆,又把这一切拉回到日常化的情景中。他说,我们赶去吊唁时,看见他安详地躺在卧室靠左的一张床上,身上是一条粉红色的棉质夹被,脸上蒙着洁白的纱巾。他的口眼紧闭,头发里夹着几根白丝,面容虽消瘦了些,却并不怎么难看。我一眼看去,一张半旧半新的书桌,上面杂乱地放着书籍、原稿、两支金不换毛笔,旁边有一只有盖的瓷茶盅。房中显得比较凌乱,桌子尽头是他在文章里经常提到的藤躺椅。壁上挂着些木刻和油画。海婴是鲁迅唯一的儿子,那时才七岁,这天真的孩子,还不懂得人生的忧患,在那里跑来蹦去的。这庸常生活的气息与普通人家的举丧没有什么不同。

他还用近于诙谐的笔触写道:有人建议国民政府把绍兴县改为鲁迅县,但没有下文。为了鲁迅县的搁浅,连改绩溪县为胡适县也作罢论。倒是那位官方发言人王平陵,在他的家乡溧阳县,首先有了平陵路了。为了纪念鲁迅,中共在延安设立了鲁迅艺术学院,训练了抗战时期的革命青年。中共是懂得政治宣传的。他们中间值得纪念的并非无人,而独纪念了鲁迅,这种聪明做法超过了当局。

曹氏临末还不忘添上一笔。他知道鲁迅和郭沫若之间是不怎么和谐,他们生前从未见过面。鲁迅死后,郭沫若开始说他的好话(和《革命春秋》中所说的话大不相同),意思是:“考虑到在历史上的地位,和那简练有力,极尽了曲折变化之能事的文体,我感觉着鲁迅有点像‘文

① 郑振铎:《永在的温情》,《文学》(上海)第7卷第5期,1936年11月1日。

② 郁达夫:《怀念鲁迅》,《文学》(上海)第7卷第5期,1936年11月1日。

③ 巴金:《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中流》(上海)第1卷第5期,1936年11月5日。

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但鲁迅的革命精神,他对于民族的荣誉贡献和今后的影响,似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郭也是当代的能文之人,这些话,却使我们看不明白,既非违心之论,必是敷衍了事的纪念文字。曹聚仁知道鲁迅平生是最讨厌韩愈的,两人风格相去甚远。<sup>①</sup>

如果从“文人圈子”的角度读这些文字,没有人觉得奇怪。即使有一些文学修辞的成分也是能够理解的。第一,鲁迅毕竟是五四一代离世的重要作家。第二,追述者都是与鲁迅亲近的人,这种“剧烈”反应在情理之中。第三,与五四时代相比,上海时期的鲁迅已经有了某种象征的意味,尽管各方面的看法莫衷一是。

在历史长河中看,1930年代当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洋务运动之后的第二次“现代化”进程正在全国城乡上下全面铺开(茅盾的小说《子夜》《春蚕》描述的就是现代化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及各阶层利益冲突),日本人借助“9·18事件”开始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内各种矛盾也在持续激化。这个民族的历史时运并非丝毫未见。各种历史可能性会随时发生。不管鲁迅的拥戴者有意还是无意,他们的举动都与这个“大历史”做了联系。透过鲁迅之死,人们还可以将眼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外发生的这些“社会故事”上稍作停留: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国民党政权的血腥镇压和疯狂迫害下,中国革命遭受了很大损失。1931年底,中共临时中央成员被迫分批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1934年10月,在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年后,历经坎坷的红军抵达陕北,但又陷入国民党中央军和张学良东北军的重重合围之中。1931年2月,革命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此后几年,应修人、洪灵菲、潘漠华等相继遇害。1933年,丁玲被绑架,传言“已由某机关判处无期徒刑”。<sup>②</sup>上述情形,使得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有充分理由不把“文学”与“政治”看作两个没有联系的因素:“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战线,

① 曹聚仁:《鲁迅评传》第146—148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

② 渡:《丁玲的近讯种种》,《社会新闻》第7卷第1期,1934年4月3日。

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而且前者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sup>①</sup>实际情形也与这著名的“后设”大致相符,国民党从文化和军事两个方面剥夺了左翼文化存在的合法性,这就使一向反感、抵制思想文化专制的鲁迅,在无形之中与中国反主流文化思想的斗士结成了盟友。有事实表明,鲁迅与被捕杀的共产党员作家中的一些人曾过往甚密。柔石被捕时口袋里还藏着鲁迅在北新书局印书的合同。鲁迅这时有些紧张,也在情理之中。他不得不烧掉一些朋友的书信,匆忙离开自己的寓所。他在友人内山完造的帮助下,隐匿在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旅馆避难。在副楼楼梯底下一间小屋里,儿子海婴和女佣使用一张大床,鲁迅和许广平在靠门口的小床上暂住。这里的过道上摆着火盆,鲁迅常常坐在火盆边的椅子上取暖。这样的情形,当然十分危险而狼狈。他未必以为自己在从事“革命”事业,但他这样做却能够使人们在“革命”的范畴中来思考鲁迅的历史命名问题。另有消息传出,刚刚得知鲁迅辞世的消息,毛泽东就通过冯雪峰把自己列入治丧委员会名单<sup>②</sup>,延安等地还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鲁迅周年忌日,延安又发起隆重的纪念大会,毛泽东亲自到场讲话,这个讲话,后来以《毛泽东论鲁迅》为题发表在1938年3月1日出版的《七月》杂志上。如果警省的鲁迅还活着,对这种文学之外的宣传不知该做何感想。显然,“鲁迅之死”已超出上海滩一个孤立文学事件的范围,而变成了大历史的一个部分。与此同时,这个事件也提出了如何评价鲁迅——即对鲁迅做历史命名的要求,它不光是文学史的命名,同时也包括对政治文化的命名,虽然它比最终的文学史命名早发生了将近20年的时间。

我这样说,不是有意把研究对象串连到大历史的线索当中来构建这本书的逻辑基础,而是意在表明,所谓文学史命名与这些大大小小的

---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7页,人民出版社,1991。

② 当时上海、南京、广州和武汉的主要报纸都作了报道,成为引人瞩目的“新闻”。

线索并非毫无牵涉。当然,“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化除此主要线索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别的次要线索,我将会对它们另作讨论。我想借此声明,鲁迅在“当代”的经典化除大历史层面外,还存在着若干大大小小的层面,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本书中全部解决。

## 一 1938 年的武汉

请允许我仍把我的研究对象放在 1930 年代。理由是,虽然对郭沫若的文学史命名始于创造社时期,他因大战文化名流胡适、鲁迅,写出名噪一时的《女神》而进入文学经典化的程序,但他更高的文坛与政治声望,却是在他流亡日本十年之后重返中国的 1930 年代奠定的。如果故意忽视 1930 年代,那么郭沫若成为比一般创造社作家更大的文学史经典,或说“鲁郭茅巴老曹”之一员,就是无从解释的。

在 20 世纪 20 至 80 年代这一漫长的历史中,郭沫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我们看看当年他与胡适等人闹得不可开交时,徐志摩专程跑到杭州见创造社诸将,想调和矛盾,以及徐后来对这件事的记述就可知道。在 1920 年代一代作家中,他是唯一集“从文”“从军”“从政”等丰富经验于一身的人。1926 年,由于受到蒋介石的欣赏,他在北伐军中由宣传科长升任为政治部副主任。一年后因公开加入共产党遭通缉,秘密流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诗》《书》《易》和甲骨文研究。1937 年 7 月 27 日,郭沫若应邀从日本横滨乘“皇后号”客轮回到陷入战火的故国。作为北伐战争中的风云人物,郭沫若的身份已由“创造社文人”变为“文化界领袖”。时势需要他把北伐时娴熟运用的“全民总动员”方式,拿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当中,要他以一个“公众人物”的号召力参与民族救亡的社会实践,而这一角色,恐怕只能由郭沫若来担当。虽然当时文化界领袖蔡元培、胡适比郭声望更高、名气更大,但他们却难与政界、军界和战事建立如此直接和深入的联系。1930 年代的国难情事,决定了郭沫若将会以这种方式登上历史舞台。所以,郭沫若“归来”的讯息,很快成为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等重镇各大报刊的

“号外”。<sup>①</sup>人刚登岸,他那首步鲁迅原韵的七律已经在朋友中不脛而走,被上海滩的各家报刊竞相登载: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今天看来,鲁迅之死与郭沫若的归来仿佛是1930年代故事的开头和结尾,它极像一个隐喻,昭示着左翼文学阵营正在展开的历史性格。鲁迅之死是“文人之死”,他即使晚年加入左翼文学阵营,卷入文艺论争和文坛是非,但由他开始的左翼文学故事很大程度上仍然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学故事”;而郭沫若的归来则意味着这种“文学故事”的历史终结,他的为文、交友方式和历史心境都标示着与鲁迅的断裂,左翼文学从此带上了战争、政治的浓厚气味,与此同时也将留下与鲁迅时代不同的历史痕迹。

但是,史家不忘打断这些想象,把我们的思绪拉回郭沫若当年繁忙的迎来送往的活动中。不过,这不像是一般朋友的往来应酬,透过这各不相同的礼节,人们注意到有一种力量正在悄悄地把郭沫若从“文学界”推到“战争文化”里面。不管他是否愿意,都无法拒绝那只无形的手对他的选择,他只能以这种方式进入我们所讲述的1930年代:1937年春,党国要人张群、何应钦忽然想起郭沫若与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于是敦促蒋介石取消对郭的“通缉令”。接着不久,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口气是以委婉恳切的方式来表达的:“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又及,“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sup>②</sup>当年7月27日下午,官家的礼遇果然不同。郭沫若的船刚停靠上海公和祥码头,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便受命前来接驾。郭沫若说他当时借机“逃脱”,到别处

① 参见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第18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② 同上。

去会老友故知了。读者都不在现场,此种说法当然无法证实。但我们知道,后来郭沫若还是陷入当局“迎来送往”的车轮大战中:被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宴请;8月,赴昆山叩访陈诚、冯玉祥、薛岳和黄琪翔诸将领;9月下旬,在南京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给我一个相当的职务”<sup>①</sup>;当日,受周至柔宴请;后见张群,并由他出面约见孙科、汪精卫、邵力子、陈铭枢等人;1938年元旦,正在广州紧张筹备《救亡日报》的郭沫若,又收到陈诚“力邀”他北上武汉的电报。遥想郭沫若十年前从上海化装仓促登船逃至日本的尴尬经历,此景彼景真是天壤之别。试与创造社同仁比较,郭的身份此时也非同一般,在中国,文人只要进入这种历史螺旋过程,他就无法再宣布自己是“普通的文人”……

在当局紧锣密鼓地拉拢郭沫若的同时,其他方面也在主动与他接洽并做相应安排。潘汉年在郭归国三天后得知消息。据夏衍回忆,“沫若回到上海大约十天后”,潘汉年“向我传达了恩来同志的口信,由于当时已经考虑到《新华日报》不可能很快出版,所以明确地决定,由上海‘文救’出一张报纸”——这就是后来郭沫若担任社长的《救亡日报》。而且,除潘经常叩访外,“我和阿英轮值,几乎每天都去看他一次,并把他的情况随时告诉汉年”<sup>②</sup>。《郭沫若传》和《郭沫若自传》等也为读者留下了郭由广州北上武汉后与共产党人频繁往来的翔实记录,现抄录如下:1938年1月9日晚,在武汉参加了叶挺、王明、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举行的欢迎会;次日,被叶挺邀往太和街26号新四军筹备处下榻;29日,收到周恩来“请你们明天晚上来和我们一起过年”的信函。有趣的情形还在后面。郭因不满国民党在第三厅安插特务,去长沙不归。但领导方面很有耐心,他们派与郭关系日益紧密的于立群女士前去接迎,郭在《郭沫若自传》中追忆:“我

① 《郭沫若自传》第23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② 夏衍:《懒寻旧梦录》第379—38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5。

禁不住心子急跳,同时我也看见立群的脸忽然涨得通红,把头埋下去了。”<sup>①</sup>领导方面甚至还想到:“我在这两天将各事运用好后,再请你来就职,免使你来此重蹈难境。”<sup>②</sup>当然,对十年前曾在国、共两党之间穿梭,且都有故朋旧友的郭沫若来说,有这故事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我们却知,作为“文坛领袖”是不能只在“文人圈子”这个小范围内活动的,他的交际面应该扩大到社会各界才行。

可惜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不记载郭沫若的这些史迹。我当然也不以为这是“文学的故事”,但却相信它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学故事”的建构,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还是更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说五四文学是对郭沫若的第一次文学史命名的话,那么1930年代的战争文化则是对他的第二次文学史命名,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现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上面说过,在历史上鲁迅和郭沫若从未视对方为自己的文学“同志”,当然也不认为大家同属左翼文学阵营。在郭沫若及盟友批评鲁迅的言论中,他们把自己的时代理解成与鲁迅时代的“断裂”,所谓的“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即是这种“断裂论”的思想基础。但令人吃惊的是,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参与和建构,却不经意地填平了这种断裂的鸿沟,使郭沫若成为鲁迅精神的正宗继承者,这是人们都熟悉的著名的文学史经典结论。1938年夏,在郭沫若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位上出走的同时,人们听到了另一个消息:“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sup>③</sup>这个通知传布范围很小,还具有机密性质,却释放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郭沫若对“鲁迅传统”的继承关系被正式命名;二是他的“文学身份”被纳入道统的轨道上来,这就对“现代文学”的郭沫若与“当代文

① 《郭沫若自传》第260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② 参见《周恩来书信选》第138、1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③ 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2期。

学”的郭沫若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性进行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就后一个问题而言,“厅长”可能只是一个官僚职务,任何人都可以干,有时还给人某种“不干净”的感觉;而文化界“领袖”则是社会公议的裁决者也即道统的化身,它很大程度上只能在社会公认的少数比较“干净”的知识精英中间产生。因此,“文化领袖”往往比“厅长”更容易获得人民大众的尊敬,在社会伦理和心灵的层面上得到普遍认同。三年后,在重庆举行的郭沫若 50 寿辰庆典上,有关人士就这样把鲁迅的文学叙事与郭沫若的政治文化叙事巧妙地衔接了起来,他在《我要说的话》中指出:“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人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sup>①</sup>这种论断不光对文坛怨恨做了转移、隐匿、稀释,更重要的是它证实了我前面说过的历史参与文学史建构的非凡能力,以及人们对战时中国社会道统的重新解释。正如有人敏锐指出的那样:“道统即是一个王朝、一个政治集团据以立足的基本理念:你凭什么统治?你要把人民、国家和社会带到一个什么地方、达成一种怎样的境界?任何一个想传诸久远的政治集团都必须重视道统,而任何有力量的道统都必须是民族最源远流长的文化与时代最先进文化的结合。道统往往同大文化人、大思想家连在一起,文化人往往成为一种道统的化身。所以共产党先是推举鲁迅,鲁迅之后周恩来又选中郭沫若。”<sup>②</sup>纯粹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则意味着中国左翼文学从此有了前仆后继的内容,包含着“再次经典化”的意义。与此同时,也指出左翼文学所从事的文化使命,已经不再限于在上海街头撒传单抗议的概念范畴,它通过自觉转型

① 见 1941 年 11 月 16 日重庆《新华日报》。

② 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第 34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开始直接介入到社会变革的实践当中。这样,文学的概念便被更换为政治文化的概念。从抗战爆发后发表的大多数文学作品看,五四文学的审美目标已经成为历史,它的终结中正包含着这种“再次经典化”的特殊意义。

对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来说,关于它历史命运的最重要的两幕就这样完成。鲁迅之死成为它历史合法性的真正起点,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对它的诠释、争执和定位都是以此为依据的;而郭沫若是左翼文学由思想文化领域转向政治文化实践的标志性人物,无论是历史选择还是个人秉性都决定了他要担当此任。当然今天看来,左翼文学的“发生史”线索固然繁多,有多种解释的可能,但由鲁迅到郭沫若的这条线索仍然无法规避,如果我们想要进一步了解“左翼文学”与“五四文学”的复杂纠缠和精神联系的话。

## 二 毛泽东的评论

如果这样去理解作家的经典化过程,我们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并不尽然是在“文学”范畴中完成的。人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作家形象,虽然明显受到不同时期的文学史著作观点的影响,它的最终完型,却是在当代社会和当代学术中进行的。根据这种特殊的文学史状况,今天的文学史研究就不能只在文学的层面讨论问题,也应该在当代文化的层面讨论问题,包括对一些与权威叙述相关的各种现象和历史线索的重新梳理。按照这一理解,走进“当代”的鲁迅研究应该吸纳进毛泽东的评价眼光及其重要观点。作为鲁迅经典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历史源头,这种眼光和观点对延续了六十余年的“鲁迅研究史”,构成了重大的支配性的影响和启示。

毛泽东是接受过五四新文化洗礼的政治人物,他创办的新民学会和《湘江评论》是那种带有鲜明五四色彩的社团和期刊。可他当时的兴趣主要在政治、哲学上,不在新文学方面,所以鲁迅当时没有进入他的阅读视野。不过,从毛青年时期的《讲堂录》(1914—1915)、《伦理学